

朝伯凉茶

陈冲

家乡杨梅圩,在那渐渐渐远的记忆中,许些人和事都忘了,模糊了,但朝伯凉茶,一直烙在我心灵的深处,历久弥新。

朝伯凉茶,没有店铺,没有招牌,只一张方桌,上面搁一椭圆形的大瓷罐。瓷罐被擦得锃亮,旁边桌面倒扣着几排玻璃杯。瓷罐下有个铜开关,客人来了,一拧开关,凉茶注满杯。客人端起,慢慢饮下,细细品味,饮完最后一口,随即用当地方言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哈——”,像是感叹凉茶的甘苦,又像是感叹喝完凉茶后的清爽,然后毕恭毕敬递上五分钱给朝伯,说一声“唔该晒(多谢了)”,才恋恋不舍的离开。其时,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朝伯的凉茶档,设在一株俗名叫“能木”的树下。树一人多高,枝繁叶茂,向四周漫去,像把巨罗伞,整齐美观得如同修剪过一般。可以遮阳,可以挡雨。以防不测,朝伯又在树下加了一张大蓑衣。每逢圩日,不少“趁圩佬”便到这里纳凉喝茶,讲趣闻,听趣闻。朝伯凉茶档,俨然成了“趁圩佬之家”,热闹非凡。

朝伯凉茶档,南邻邮电所,东邻超华缝衣店,西邻帝普单车修理档,北邻粮所验收“公购粮”的大广场,周边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有些人不是头痛脑热、发痧感冒,纯属口渴,也来喝杯朝伯凉茶。

朝伯凉茶始于何年,我无从得知,但自我懂事起,就看到朝伯在这里摆凉茶了。那时,他五十开外,理个平头,穿件黑绸唐装衫,我们称它为“凉水衫”。他身体一动,或遇点风,那衫便悠悠的晃动,像水波纹一般,煞是好看。这在我们孩童的眼中,简直太高档了!

朝伯是杨梅村人,他的凉茶取材,不是从中药店买来,而是他亲自到附近的山野采挖,没一丁半点西药,没有一点副作用。当地群众很是喜欢,谁有个头痛脑热,哮喘咳嗽,鼻塞流涕,便花上五分钱到朝伯那里喝上一杯,管保见效。当地农民,圩上居民,乃至店员、干部,凡发烧感冒,都找朝伯,喝杯朝伯凉茶。这已成习惯,达成共识。当父母的,发现孩子发烧流鼻涕了,即叮嘱赶快到朝伯那里喝杯凉茶;年纪还小的,便亲自带去,让他(她)喝上一杯,付过钱,信心满满的离开。次日

孩子退烧了,能吃能喝了,欢蹦乱跳了,喜得家长眉开眼笑,特地赶到朝伯那里道谢。朝伯听了,笑笑,也不说什么。

有些患者,手头拮据,一时拿不出五分钱,朝伯慷慨全免。患者千恩万谢,感激涕零,更觉惭愧。朝伯安慰说:“不用这样,本乡本土,朝冲(看)晚见,大家兄弟叔侄,我送杯凉茶给你喝,好应该的!”

常言道,人心都是肉做的。朝伯乐施好善,大家也知恩图报。那些受过恩惠的,那些被朝伯治好病的,什么时候家里养了大阉鸡,或新

挖了番薯芋头,或有什么好吃的土特产,便借趁圩之机,带上一只大阉鸡,或捎上一篮土特产,送到朝伯的凉茶档里表示心意。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朝伯驾鹤西去了,闻讯赶来送葬的群众逾千人!这在当年的杨梅,实属罕见,轰动一时,传为佳话。

朝伯凉茶不复存在了,但朝伯凉茶的美名,朝伯凉茶“确系使得(确实效果好)”的赞誉,依然在当流流传至今。朝伯,在当地百姓的心目中,是凉茶人,更是恩人和朋友。

茂名印记

二十多年前的 茂名市油城九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茂名市中心城区由河西向东转移,一路向东发展,九十年代初期,作为茂名市的主干道油城路,已陆续开通了油城七、八、九路,接通当时刚刚建成的高水一级公路,打通了茂名城区的东出入口。“老照片”是2000年左右拍摄的,当时我背着相机冒险爬上刚刚封顶的电信大厦楼顶,向西面拍摄了市区油城六、七、八路,向东面拍摄了正等待开发的油城九路,还拍摄了正在建设中的文化广场。当时油城九路建好的楼房只有公安局办公大楼和宿舍楼,城中村沙田坡村还未改造,高水路东面是一片农田和水塘,未有油城十路。

图/文 黄信涛

“溜冰”记忆

陈汝雄

前不久,我们来到漠河北极村旁的黑龙江游览时,导游介绍,这里最冷时达到零下五十多摄氏度,每年冬天黑龙江都会结成十几二十米厚的冰层,长达八九个月,连大巴车都可以在江面上安全行驶。冬天的黑龙江面成了人们的欢乐园,男女老少都会到此溜冰,热闹非凡。这种场面对我们这些南方游客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只可想象而已。由此,让我联想起自己年轻时的一段“溜冰”记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广东石油学校(现广东石油化学工业学院)学习的最后一个学年,学校在运动场后面新建起一栋化工楼,让我们有机化工(五)班抽几位同学搬到一楼西头住,既可缓解学生宿舍紧张的状况也解决了新楼无人看守的问题。于是,班长抽选了我们六位同学到化工楼驻守。临毕业时,有一个傍晚,吃完饭后,我来到楼上散步,发现走廊刚刚铺了石米地板,平坦宽敞明亮,且不知是哪位同学或老师曾在此“溜冰”,留下一双四轮轮滑鞋,又惊又喜的我是穿上轮滑鞋也尝试溜起旱冰来。我扶住墙壁,试着滑动起来,觉得还能走几步。随后,我把手从墙壁

松开,刚滑出脚,身体便失去平衡,摔一跤。我爬起来,让身体保持平衡,并拢着双脚慢慢使劲,可没滑出两米又摔一跤。就这样,摔爬起来又滑,滑几步又摔倒,反复练习多次掌握身体平衡后,我居然可以滑起直线来了。之后,晚自习前,我很少去图书馆了,而是跑到化工楼上这间新装修好未投用的大课室,偷偷练习起溜旱冰来了。很快,我便能绕着大课室一圈一圈顺畅地“溜冰”了。可惜,好景不长,不久后我们就毕业了,离开学校,也离开了曾给我枯燥的校园生活中带来一丝快乐的化工楼。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茂名石化公司露天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露天矿最红火的时候,那里兴建起了名闻全国的“矿工之家”。“矿工之家”不仅有影剧院、图书馆、球场、游泳场、健身房,还有几个小湖,湖里有小船和碰碰船供职工及家属休息时游玩,且有一个“溜冰”场。每当夜幕降临,最热闹的地方当属“溜冰”场了,当时穿着四轮轮滑鞋在石米水泥铺就的溜冰场上溜旱冰是件新鲜事儿,晚上那里人山人海,前来尝试“溜冰”和看热闹的人络绎不绝。我跟一位工友晚上前往“溜冰”场观

摩几次后,也心动了,自己觉得在油校上学时学会了溜旱冰,便买了一双四轮轮滑鞋到那尝试滑起来,可是一连几晚我都不敢往波浪谷冲,生怕摔倒被看热闹的人笑话。有位工友经常牵头,带着一群“溜冰”发烧友往波浪谷冲,他们个个身手敏捷,一溜烟便一个接一个冲过去,划出一条优美的波浪弧线来,令我艳羡不已。于是,我也壮着胆子,往波浪谷冲,可能是起跑速度不够,冲过最后一个波浪就要上到平地时,冲不上去了,我一使力,只有前脚冲上去,后脚无力跟上,打了一个跟头,身体快要倒地的一霎那,我用手撑了下手,终于借力冲上了平地,可我的眼镜却掉地了,只好滑到场边抓紧围栏。此时,听到场外的人在嘲笑我:“眼镜仔把眼镜摔掉了,哈哈!”好在随后滑过来的工友俯身捡起我的眼镜,然后滑到我身边交给我,否则,我什么也看不清,难于收场。八十年代中期,我调走后,离开了露天矿,再也没有去滑过旱冰了。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回想起那两次短暂的“溜冰”时光,曾给当年身处繁忙学习和户外作业的自己带来过些微的欢快,慰藉着自己那苍白的青春岁月。

“大陈”同学

毛勇强

“大陈”,名叫陈学洪,身高约1.80米,方面大耳,魁梧奇伟,典型的北方汉子。因此,得了这个绰号,大家都称呼他“大陈”,他也十分乐意接受,还经常自称“大陈”。

那是1988年8月,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在吉林省农行干部培训学校举办首届记者培训班,每个省(区)派一名学员参加,“大陈”来自北京市农业银行。他是办公室的资料员,年轻又资深的通讯员,在全国各级报刊发表了一批文章。不仅如此,他还是单位杂志的美术编辑,早在前往长春学习之前,我就多次欣赏过他的美术作品,尤其是插图更加了得。他的作品构思巧妙,笔法娴熟,线条流畅,不仅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听说还引起了总行有关负责人的关注,有将他“上调”的意图。

“大陈”生在北京,长在北京。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市农业银行。天生我才必有用。人行不久,他的才能被组织发现,于是把他从基层调到机关,安排在办公室工作。

“大陈”不仅具有真才实学,而且学习勤奋,关心集体,团结同学,乐于助人,性格豪爽,平易近人。因此,开学仅几天时间,我就和他交上了朋友。在学习期间,他经常向我了解广东改革开放的情况,我一一向他作了介绍。课后,我们经常一起讨论写作,或者散步、打排球等,成了形影不离

的“同学”。

开学约半个月时,一天晚上,我和几名同学打乒乓球,由于势均力敌,打得难解难解,结果汗流浃背。回到宿舍后,没有及时擦汗,便到窗口叹自然风。当时,已是初秋,晚上凉风习习,我觉得十分痛快。但是,当晚引起了重感冒,发冷发烧,浑身疼痛,动弹不得。后来,才知道这是“过堂风”,很容易引起重感冒。如果不及时医治,将会危及生命。当晚,我吃了感冒药,饮了大量开水,症状有所缓解。可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二天,我只好向老师请假。大陈知道后,课后(当时学习比较轻松,上午上课,下午自习),来到我的床前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他说,病得太重了,仅靠自己不行,必须立即看医生。

我们学习的干校在郊区,于是他扶着我搭上了前往长春市的公共汽车,到长春市人民医院诊治。到医院后,他去排队挂号,扶住我让医生诊断。然后,安顿我好我,他去排队取药。就这样一连七八天,一有空他就陪我,帮我取饭、打开水、煮中药端到我的床前,还和班主任联系,叫厨房师傅为我做病号饭。在我患感冒的那几天,他还专门借了两个铝桶,几次打热水背上我的宿舍(五楼),让我冲热水凉。所有这一切,使我感激不

尽;亲兄弟也不过如此啊!

一连几天,我都不能上课,细心的“大陈”担心我落下功课,在上课时将老师的讲课内容录音,然后拿给我听,以便跟上课程。在“大陈”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我的病情逐日好转,终于可以正常上课了。对此,我感激不尽,不断的表示感谢,他说,大家同学不要客气。

学习结束后,我们依依不舍地分手了。几十年来,我一直保持联系,有时书信来往,有时通电话,有时发信息,友谊不断加深,亲如兄弟,情同手足。1997年10月,我到北京参加中国第三届农业博览会,与“大陈”联系上,他到我住的宾馆作客。久别重逢,格外高兴。我将特意从茂名带去的“南国人参”(圆肉)作为见面礼,他十分高兴,一再表示感谢。当时,他母亲患病住院花了一大笔钱,手头十分拮据。可是,他还是到商场购买了松子等土特产送给我,使我十分感动!

如今,我和大陈都光荣退休了,过上了闲赋的生活,共享天伦之乐。后来,我们还加了微信,联系方便多了。我们经常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特别是高兴的事情,互相分享,乐融融。我在遥远的南国,遥视兄弟般的同学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心想事成,活出真我的风采,潇洒的人生!



红色故事连载

风起云涌(之二)

许向东

本来,深眼梁从心底里就看不起张大拿,认为张大拿没读过几天书,肚子里无半点墨水,又贪得无厌,恶名在外。他常在背后对人说,如果在前清,张大拿这样胸无点墨的家伙一定坐不了区公署这把交椅。但一事归一事,在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认知上,他和张大拿的观点十分接近,臭味相投,所以二人也就谈得来。加上张大拿为亲友子弟读书的事没少找他帮忙,而他为亲友捐税、官司及兵役上的麻烦之事也时常联络张大拿。二人也就颇为投机,时不时在一起喝酒吃狗肉或者到瓦片巷妓馆和南康间大烟馆去快活一下。

深眼梁收到朱也赤来茂南的风声,甚为紧张,多方打探,了解到朱也赤带来两个助手:一个是杨绍栋,字伯良,茂南石浪乡锦堂村人,家里拥有大量田产,1921年去广东大学读书,期间结识朱也赤,追随朱也赤回高州搞共产,成为朱也赤回茂南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他25岁,高个子,方脸形,大眼睛,皮肤白皙,头脑灵活,做事干练,性格坚毅。见过他的人都说他像一名军人。此时,他被任命为茂南农民运动特派员,茂南区农民协会筹委会主任,并负责国民党茂南区党务。另一个是刘竹虎,又名蜀虎,字文伦。23岁,茂南公馆书房岭村人,省立九中毕业,由朱也赤介绍在高南皋学舍参加共产党,时任茂南区农民协会筹委会副主任。

深眼梁记得那年“五四”,就是首先在学生中闹腾起来的。在京城他们可是连赵家楼都敢烧的,这可得!共产党成立后,往往也是走这个套路。他早就听说在许多地方的共产党都是这样干的。茂南就这一间中学,朱也赤来茂南,不到南中来搞事才怪!他很担心自己经营了七八年的盘子被朱也赤掀翻了。为此,他必须和张大拿结盟,借力抵制朱也赤。他相信张

大拿会帮自己的。这天晚上,深眼梁让学校听差(校役)朱旭芬打着灯笼,陪着他走牛车街石板路去区公署官邸找到张大拿,商议拒朱防赤大计。

这牛车街是明清年间形成的。粤西地区少马而多牛,常用牛车载人载物。官员和富人出行除了坐轿外就是乘牛车了。牛车上设一车厢或凉棚,坐起来又比轿子宽敞舒服许多,因此官府多设在能够通行牛车的街道。牛车街由圩头官道一直通到圩尾出去俗称大埠口的白沙河码头。现时公馆大埠口村由此得名。在主要依靠牛车和手推独轮车为主要运输工具的年代,此街既是官道也是公馆街的交通咽喉要道。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是如此。

牛车街宽约三米,中间拱起很高,两边有两条岁月碾压出来的很深的车辙,典型的鸡胸型路面。这道路行牛车挺便捷,行人走路就不那么顺畅了。平时很少走路的深眼梁走起这样的路来就别提多吃力了。他由朱旭芬打灯引路走到这里,再爬上设在三层的张区办公室,已是气喘吁吁。

“除了喝酒消遣,梁校长你从来都不会晚上来找我的。你这么急急忙忙的过来,到底是为了何事?”张大拿问。

“还能有什么事,不是听说朱也赤要来茂南吗?”

“这可真是一件大事!我原本打算下午去学校找你聊一下的。你遣人过来约我要晚上过来见面聊事,我就没过去,专等你晚上过来。”

“朱也赤这一下来,茂南这边可能会有麻烦了!”

“确实会有问题。”张大拿说:“自光绪末年至宣统,特别是大清倒台以来,天下就没有消停过。这茂南更是如此。一会闹会党,一会闹革命党,一会海南或广西的军队打过来打过去,一会是粤军横扫过

来,收复地盘,弄得人心惶惶。我们茂南还好,离县城远些,山高皇帝远,很少有什么风能刮得过来。除了民国10年广西军队在石鼓圩打了两天,我们茂南地带基本上就没发生过什么大事。民国8年,京城和省城学生都闹哄哄,高州的学生也上街搞事,茂南却十分平静。这主要是得益于远离高州城这个是非之地。革命军收复南路后情况也是如此。但这次不同了,朱也赤来了!茂南人在省城做省长、厅长的一大把。省长就曾发话,只要有省立第九中学(1933年改称高州中学,下同)毕业文凭的,都可以找他在省里安排一份公差。朱也赤在省立第九中学做过学生会长,是出了名“读爆书胆”的学生,他去广州读到大学毕业,不在省里谋个正儿八经的官位,却被共产党说洗了脑,把名字从“朝柱”改为“也赤”,热衷于搞什么“国民革命”。现在县里他既是国民党统领,又是共产党头目,还是共产党南路的要人,是搞赤化的死硬分子。没几个月,就在高州成立了一大堆的赤色组织,把县城弄得鸡飞狗跳。他来茂南,能让我们睡好觉吗?”

深眼梁张大嘴巴,呆呆的听着,像是在发愣。当然,张大拿说这些东西,并非要询问梁深远的意见,只是就事论事,分析一下时局。见梁深远不吱声,他又说:“我们确实需要认真商议一下,看看如何对付他。不然就有大麻烦的。”

(待续)

※杨绍栋,字伯良(1901—1928)广东茂名县石浪乡锦堂村人。1922年就读于广东大学。1926年1月由朱也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茂名农协特派员和茂南农协筹委会主任和国民党茂南区党务负责人。1927年1月任中共电白县支部书记。同年4月转入地下斗争。1928年9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